

中国的新发展阶段 和社会改革

李培林

中国的新发展阶段应该表现在各个方面。中国在金融危机以后进入新的阶段，比如讲拉动经济因素，更多的从依赖投资和出口转向依赖各类消费，或者讲从高碳经济转向低碳经济或者无碳经济，或者讲从中国的制造转向中国的创造——这是在不同方面对新阶段的新要求。

我今天的话题更多是从消费谈起。就是说我们要转向使中国的经济增长更多地依赖于消费。庆幸的是尽管中国和美国很多方面都有根本分歧，但在扩大中国国内消费方面，中国的看法确实和国际上的看法高度一致。

首先我们来看，中国的消费存在着一个较低的水平。例如整个消费率，即居民消费率，指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从1985年到2008年，这个比率从52%降到了35%。35%的居民消费率在全世界都是一个非常低的水平，特别是和美国的70%以及日本的65%相比，水平更低。

美国3亿多人，每年大概消费10万多亿美元商品，中国13亿人大概每年消费1万多亿美元商品。中国的经济增长要靠工业化推动，工业在整个GDP中的比重是全世界最高的。而工业化的推动更多依赖于出口，因为我们自己的市场没有办法消化这么多的产品。

本来一个国家的消费力过低，很大的情况下是和收入相关，也就是说没有足够的收入来支撑消费。但以中国的情况来看，我们又看到一些相反的情况，中国好像存在着巨大的资金，

这些资金现在并没有被真正用于消费。政府现在很有钱，从1994年到现在，中国政府的税收从5000多亿元人民币增加到5.4万亿，年均增长大概是18%左右，远远高于GDP增长。

在中国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省一级政府，好像手里很有钱。是不是老百姓没有钱呢？好像也不是，1994年到2009年的3月，中国城乡居民存款余额从2万多亿增加到24万亿，相当于四分之三的GDP总量，而且这个趋势还在进一步发展。用不到几年，整个城乡居民储蓄总额会相当于当年整个GDP的数量。

这么多的钱去哪里了？为什么没有用于消费？现在政府不断希望用低利率的政策来促进人们消费，按照现在银行的一年期存款利率，现在存钱是要贬值的，因为我们的物价上涨已经超过了3%。银行还有利息税，还有手续费，所以存在银行里边的钱是不赚钱的。但是尽管如此，中国的储蓄还在不断增长。

原因在什么地方？很大的情况下和我们的发展方式、社会结构密切相关。也就是说，我们整个的发展是靠工业化推动的，这种推动的方式造成了中国特殊的现象，即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严重背离。

在现在的经济结构当中，也就是在GDP结构当中，农业增加值占整个GDP的比重会降到10%左右，发达地区就更少了。但在劳动力结构当中，在从业人员当中，农业劳动比率还在38%，以农村常住人口来计算还有52%。

这个和国际化的标准是严重背离的，GDP 农业产值降到 10%，正常情况下，劳动力结构中从事农业的人员应该降到 30% 以下，农村居民的人数应该降到 40% 以下，所以才有社会学家会说社会结构的转变落后于工业化的转变 15—20 年。

我们面临的挑战在哪里？就是所谓中国经验，所谓中国道路，30 年来最大的成就是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如果说我们有什么最大的失误或者副产品的话，那就是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这种情况和整个社会结构是有关的，不仅仅是收入问题，而且是整个社会分层产生的巨大差异。

所以未来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缩小这个差距，同时扩大中产阶级的比重。这不但依赖于收入差距的缩小，也依赖于整个发展方式的转变，就是说要从以工业比重占主导，逐步地转移到以服务业占主导。

收入差距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也带来了社会和政治上的问题。如果我们主观上把社会分成五层：上、中上、中、中下、下，巴西或日本 60% 的国民都自认是中层。但是在中国，认为自己属于中下层的竟然高达 55%，远远高于印度，尽管印度的贫富悬殊也非常鲜明。但是中国由于从一个收入差距很小的国家转变为收入差距很大的国家，而且发展过程中很多不合理、不合法的因素加入到收入分配当中，不但使低收入群体不满意，中上和中的群体对此也不满意。所以要塑造一个公平的收入分配系统，不仅是简单地缩小差距，还要造就一个被公民所认同的收入分配秩序。

随着未来的发展，我们会看到这种要求，要转变发展方式，要从经济改革领域逐步步入社会的全面改革。这不仅是主观观念的转变，也是客观结构变化的要求。比如说人口，我们的人口结构从一个标准金字塔的形状到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时候已经成为“陀螺型”，也就是说中间劳动力比例是最高的。预计到 2025 年，你们会看到劳动力人口的比重和老年人的比重是差不多的状态。

所以大概还有五年的时间，劳动力无限供给状态、低成本劳动力时代即将结束，伴随着这个还有劳动参与率的快速下降。不但男性劳动参与率下降，女性劳动参与率会比男性下降得更快。特别是劳动年龄段，也就是说 30—40 岁这个年龄段劳动参与率下降更明显。

人口的结构会带来两个重大变化，一是由于劳动力增长的减少，劳动力的供求关系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这个变化会造成初级市场上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增长以及劳动权益保护要求的提高。

另一个重大变化，老龄化人口的快速增加。过去在农村是没有养老的，是靠家庭养老，但是现在你怎么让一对独生子女支撑四个爸爸妈妈？你会看到大概这个时间点，即 2017 年到 2020 年间会发生这样的转折。

我们必须在未来发展中保持一个更加平衡、和谐、均衡的发展。这个发展不仅是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也是经济和社会之间的。我们要设法建立一个制度性框架，这个框架不仅包括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更重要的还是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公民社会。

最后强调的是，我们要把 30 年来的经济改革更多地扩展到社会改革当中，特别是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收入分配等等领域，为我们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奠定一个坚实的社会基础。■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学会会长李培林在“经济转型与城乡互动”主题论坛上的发言摘要）